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12日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专门以《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为题作了重要讲话。2010年5月15日的《学习时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文章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大力改进文风、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文风、怎样大力改进文风等重要问题，深刻剖析了文风上存在的长、空、假等突出问题，强调要大力倡导短、实、新的优良文风。

文风体现学风作风，反映党风政风

打动人心、与时俱进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正能量，而文风的背后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学风，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也是领导作风。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还提出了“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和“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等具体要求。邓小平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写文章并不难，主要是意思好”，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华而不实的作风与文风。对文风不正的危害，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作出深刻论述：“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可以说，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



□ 林珊珊

提倡短、实、新，反对长、空、假

长、空、假是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进行尖锐批评的不良文风的突出特点。所谓“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干”货不多，水分不少。所谓“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所谓“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针对这三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倡导短、实、新的文风。所谓“短”，就是要力求精练简短、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开门见山，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说清楚、讲明白即可，绝不没完没了、拖泥带水，“文贵其简”。所谓“实”，就是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求真务实，或能解决问题，或能启迪心智，或能助推实践。杜绝

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所谓“新”，就是善于把文件语言和学术概念转换成易读易懂的群众语言，善于捕捉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的话语，简洁平实、通俗易懂，力求思想深刻、贵有独立创见。“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提倡短、实、新，反对长、空、假是我们改进文风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的标准，需要切实践行。

改进文风与改进党风相辅相成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良文风的总根源，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文风问题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下决心改进会风文风，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八项规定”中有三项都跟文风问题有关，即讲话要简短，力戒空话、套话；文件简报要精简，有实质内容、富有实际作用和意义；新闻报道要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

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且报道要简短精悍凝练。这三项规定分别从会风、文风、文件简报和新闻报道等方面对文风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提及了以文风促党风、以党风固文风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批评了部分文艺作品存在的质量低下、格调不高、抄袭重复的不良风气，号召文艺引领时代的风貌和风气。2016年2月，他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了党的新闻工作的职责与使命，其中的内容和要求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文风，但都与文风问题密切联系，都属于文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举措既延续了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又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改进文风党风的决心与力度。

改进文风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积弊非一日形成，纠治也非一日

之功。从根本上治理文风、彻底解决文风问题，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课题。文风不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关于如何改进文风，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三方面重点，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改进文风，首要是加强学习。既要学习党的基本理论、方针和政策，又要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事物，同时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充分地继承和运用。其次要增强党性修养。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自身的德行高尚了、纯洁了，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做到文如其人，栩栩如生。二是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尤其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呼声。只有吃透实际情况，才能形成真知灼见。领导干部改进文风，应当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在充分占有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把群众的创造吸收到文件、讲话、文章中来，使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问题。三是把改进文风

同改进党风统一起来，特别要大力改进会风。习近平同志指出，会议太多，会风不正，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改进文风会风，就要努力活跃党内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

关于文风问题，习近平同志除了在不同时期都有重要论述外，他还身体力行，带头践行优良文风。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232篇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在500字以内，不仅思想性、针对性、实效性强，而且文风朴实易懂，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及时回答了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用大白话，谈大问题”，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善于用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解疑释惑、析事明理。例如，他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来说明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样平实的话，来阐明每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用“既要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来讲明改革要辩证施治，等等。将执政理念和政治智慧通过简约、朴素的语言表达，既深刻又实在，既形象又生动，具有很强的震撼力、感染力。

习近平同志这篇关于文风问题的重要文章，全面、系统、透彻、发人深省，对当下及今后我们党的文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值得一读再读、反复品味。



“延安道路”是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路

——读〔美〕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 高冬梅



马克·赛尔登，美国著名学者，1938年生于纽约，1967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后一举成名。1968年他成为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领导者，学术研究也集中关注亚太地区和中国。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英国利兹大学的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班固端认为，这部著作“开创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1995年夏晋出版公司再出修订版。作者通过对根据地社会变迁进行微观研究，认为延安时期实施具有“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的“三三制”、大生产运动和大众教育运动等举措，使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最终取得胜利，并首次称之为“延安道路”。

“国家政权的延伸使中共广泛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网络”。马克·赛尔登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使根据地政权得到巩固、拓展和延伸，为改变社会面貌铺平了道路。

一是“三三制”。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普选的政治改革，使根据地政府向着更加负责、廉洁和稳固的方向迈出非凡一步，极大激发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拓宽了抗战的民众基础，也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代表全国的“法律依据”。这项政治变革在中国乃至当时整个第三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是精兵简政。马克·赛尔登认为，根据地精兵简政的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军队、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减少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个目标是将被精简的人员经学校培训后，安排到工厂或农村工作。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第二个目标跃居首位。例如，1942年5月，边

区政府将200名干部下放到区和乡，这既增强了下级政府的力量，有利于上级政策在基层的落实，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深入农村。

三是“纵向的双重领导制”。马克·赛尔登认为，1942年以前，根据地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在边区政府，边区财政、教育、民政等部门一贯纵向领导、各自为政，县和区以下的政府很难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管理。1942年起，边区政府实行“双重领导制”：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不再仅仅对上级对口部门负责，而且必须主要定期向县、区长及同级政府的委员会汇报工作并接受指导。同时，将很多权力从边区下放到地方，基本形成了边区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地方政府具体执行的模式。这就增强了地方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意识，有助于他们形成适合于民族战争的大众化领导风格，组织动员各部门干部和广大人民投身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

四是“下乡”运动。在马克·赛尔登看来，1942年整风运动中发起的“下乡”运动，主体是学生和画家、作家等知识分子。他们到农村协助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冬学教育等。这既让他们亲身体验农村生活的艰辛，也帮助他们认识农村的问题所在和改造农村的出路所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新观念、新技术带到农村，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这对抗战与农村生活面貌的改善大有裨益。

“生产战”“开辟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在马克·赛尔登看来，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生存危机，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把“生产战”提高到与抗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其间，减租减息、互助合作以及大生产运动等的开展，使根据地“生产战”取得巨大成就，也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他认为，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根据地最著名的社会经济纲领。减租减息实现了土地革命和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的双赢。首先，它依然有财产再分配的效果，扶持、扩大了中农阶层，

缩小了穷富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别。贫穷阶层因获得利益，生产积极性大增。其次，减租减息没有消灭和疏离富裕阶层和地方精英，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再次，在减租运动中，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农民协会等组织，进入领导阶层，改变了农村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这对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将以减租为特定形式的土地革命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表明中共对解决农民和经济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成熟的思路”。

他认为，1942年12月高干会议后，组织建立互助组立即成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战略措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群众自愿为基础、防止形式主义、因地制宜和不强求扩大规模等原则，促使1943—1945年间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这不仅使农村的经济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创造了新条件，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的社会政治关系、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得到改变。

他认为，大生产运动是一场“生产战”。1943年始于陕甘宁，后迅速拓展到其他根据地。军队、机关与团体参加生产，包括党政干部、学生、妇女和新移民等原来“非生产人员”的全民动员，以及将每个人的生产能力发挥到极限是最大特色。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根据地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与繁荣，增强了军民鱼水深情和干群之间的团结，而且开辟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充分动员和利用所有人力物力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

“教育的新进展，特别是那些激进的教育方针，对农村生活的转变是中心一环”。马克·赛尔登认为，1943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加教育设施，使“特别封闭、贫穷和被人遗忘的”陕北，在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感人的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如此，一些偏远地区的民众还是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方法上也存在不够灵活和照本宣科等问题。为此，1943年开始，边区教育与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走上大众教育的新道

路。首先，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在“发展生产、扩大办学”的号召下，教育部门将学校的管理权都交给地方。原来办在县城的学校，主管权由县政府或县教育局下放给区、乡甚至村一级政府。新办的许多学校，遵循“民办公助”的原则，直接由当地干部、劳动英雄和村领导负责管理。其次，兴办多层次的教育机构。不仅办大的、正规的小学和中学，而且办小的、非正规的村级校，甚至读报小组和文化班。新办在基层的学校，为工农大众量身定制，采取半工半读，形式有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与扫盲班等。1944年，民办学校已遍布整个边区，边区的所有人都有了上学的机会。再次，多渠道充实教师队伍。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没有正规教师文凭或经验的青年，经培训后走上讲台，劳动英雄和地方干部也经常扮演教师的角色。最后，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协同，以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扫盲和传播经济生活技能为重点。城里的正规学校和干部学校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中学教学大纲把教育目标确立为“使学生入学以养成为边区人民服务的观念始，以掌握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技术终”。教师与学生共同参加农家或村子里的农业劳动是常态。

大众教育运动，是边区在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时，师资匮乏，民众几乎全是文盲的情况下，实现教育普及和一定程度均等化的非凡道路。不仅扩大了教育范围，而且丰富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穷乡僻壤的民众得以告别文盲、接受新观念。而在当时，新观念和新技能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巨大成效。

总之，马克·赛尔登告诉读者，“三三制”、大生产和大众教育运动等举措，即“延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以及根据地经济财政困难的创造性、有效性回应。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日本和国民党的封锁和攻击下得以生存发展，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继而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延安道路”是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路，也是一条通向新中国的路。

用典释义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

【讲话原文】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设立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要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并根据形势和任务变化进行完善。党中央决定，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

【出处】
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战国）吕不韦及门客《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

【解读】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出自《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意思是说，取得胜利并不是最难的事情，保持住胜利、巩固胜利才是最难的。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持胜比取胜更难的道理。《吕氏春秋》认为，“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居安思危是繁荣昌盛的原因，而盲目乐观是事业灭亡的根由。因此，作者提出要“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虑”，正像《周书》上所说的“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做什么事情都谨慎小心，这样才能保持住胜利果实。指出“善持胜者，以术强弱”，意思是，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就有办法使弱小变成强大。

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为此，他特别引用了“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这句古语，强调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下功夫，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早在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在谈到“稳定脱贫攻坚政策”时，也引用了“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指出要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样，同样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

（杨立新）